

# 广西壮语军事行政类地名中的汉语借词考察

邓英凤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中国·广西 崇左 532200

**摘要:** 本文从语言学视角考察这广西壮语军事行政类地名的, 揭示其作为国家权力空间化符号的功能特征。研究表明, 军事行政类地名的汉语借词具有强制性、层级性和象征性, 体现了中央王朝在边疆地区推行制度整合的语言实践; 同时, 地方社会通过保留原生地名和创造混合结构等方式, 展现出对制度嵌入的文化适应。地名不仅是民族互动的历史记录, 也是理解国家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语言标本。

**关键词:** 壮语地名; 军事行政类; 汉语借词; 制度整合; 民族交往

##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place names in Zhuang language of Guangxi

Deng Ying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Minzu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Guangxi Chongzuo 532200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place names in the Zhuang language of Guangxi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revealing their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s symbols of the spatialization of state powe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hinese loanwords in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place names are characterized by coercion, hierarchy, and symbolism, reflecting the language practice of the central dynasty in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Meanwhile, the local society demonstrates cultural adaptation to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through the retention of indigenous place names and the creation of mixed structures. Place names are not only historical records of ethnic interaction but also important linguistic specime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local areas.

**Keywords:** Zhuang language place names;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Chinese loanwords;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Ethnic interaction

## 0 引言

地名是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层累性的语言化石, 也是记录民族互动历史的语言标本。广西作为壮汉民族长期杂居的典型区域, 其地名系统中存在大量壮语地名与汉语借词(本研究中的汉语借词均为音和义都借自汉语的词, 即狭义的借词<sup>[1]</sup>)交错并存、相互渗透的现象, 构成了一个研究地名的理想语料库。地名学界早已关注到岭南地区地名具有层次性, 宋长栋指出岭南地名存在“汉语地名群”与“古越语地名群”两大层次, 其通名与专名的词源差异(汉语“专名+通名”, 古越语“通名+专名”)是识别语言接触的重要线索<sup>[2]</sup>。覃凤余则通过对柳州地名的历史层次寻踪, 认为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 可窥探不同民族留下的历史文化印记<sup>[3]</sup>。地名中汉语借词的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领域中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简称“三交”)的复杂轨迹。因此, 从借词这一语言学视角进行系统考察, 对于了解民族关系的微观机制、理解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在地方社会的具体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既有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仍有可深化拓展的空间。首先, 在壮语地名本体研究方面, 学者们对大量壮语核心通名进行了深入的词源考证与语义阐释, 如黄绍光<sup>[4]</sup>、韦良元<sup>[5]</sup>、韦达<sup>[6]</sup>、覃国生、欧薇薇<sup>[7]</sup>等的成果均对壮语地名的命名特征、种类及文化内涵有系统归纳, 并积累了丰富的地名志资料, 为识别地名中的壮语底层与汉语借词成分提供了可靠依据。然而, 这类研究多侧重于地名的释义与分类, 尚未将地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 置于民族交往历史框架中加以分析。其次, 在语言接触与地名研究方面, 盛爱萍<sup>[8]</sup>、王彬<sup>[9]</sup>等关注了词汇借用的层次与机制, 相关成果揭示了地名作为接触深层成分的稳定性特征。但现有讨论多集中于借词形式的罗列与统计, 较少系统性探究不同社会领域中地名借用的动因、模式与深度差异。最后, 在民族关系与历史地理研究方面, 史学与民族学对壮汉地区的治理开发、经济网络与文化融合进行了宏观梳理<sup>[10-12]</sup>,

为理解地名现象提供了背景支撑。但这些研究未能进一步阐释地名如何主动参与民族关系建构的符号功能。

鉴于上述研究局限,本文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军事行政类地名中的汉语借词如何反映并参与制度层面的民族交往?为回答此问题,本研究将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考证、地名志文本分析与比较法,对广西壮语军事行政类地名中汉语借词进行研究,以期通过地名这一微观语言标本,为宏观的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 1 壮语军事行政类地名解析

军事行政类地名本质上是国家权力进行空间规划、治理实施与主权宣示的标准化语言工具,是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实现符号化与秩序化的直接产物。这类地名集中反映了中央政权与边疆地方社会之间在制度整合层面的复杂互动,是“三交”进程中“交往”维度,尤其是制度性、政治性交往的语言结晶。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命名行为的权力单向性与通名系统的空间层级性。

命名权的权威性体现在此类地名的确立、更改与废止往往由中央政权主导,反映的是国家意志而非地方意愿。从高层行政区到基层控制的治理单位,一套严密层级化的汉语政军通名借词系统被自上而下系统性植入地方空间。这一过程是一场深刻的空间政治实践,标志着国家行政与军事架构在实体与符号层面的双重落地。与此同时,地名专名从“音译”到“意译”的演变轨迹,进一步揭示了制度整合中的意识形态建构维度。早期为识别与管理地方,常采用汉字音译壮语地名;随着政权控制的巩固,尤其在改土归流等政策推动下,大量蕴含政治教化、道德褒扬与主权宣示意味的汉语词汇借作地名专名成为主流。卢勇斌对壮语地名“雅化”现象的研究表明,将原名改为“安宁”“归顺”等具有政治教化意味的专名<sup>[13]</sup>,正是国家意识形态覆盖并重塑地方性符号的体现。这一转变实质上是国家通过标准化命名实践,将其主导的意识形态与治理目标覆盖并重塑地方性符号的过程。

然而制度整合并非单向的覆盖。地方社会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一定的文化能动性 with 适应策略,表现为对底层原生地名的选择性保留,以及在接受国家行政框架的同时,创造性地使用“汉通名+壮专名”等混合结构。红波对柳州地区壮语地名的系统梳理显示,大量以语核心通名构成的原生描述性地名在乡村被广泛保留,构成了地名系统的稳定底层<sup>[14]</sup>。这表明地名所反映的制度整合是在中央权威推行与地方社会回应的持续互动中达成的动态平衡。

## 2 壮语军事行政类地名中汉语借词的实证分析

行政军事类地名是国家权力进行空间规划与治理整合的语言产物,其命名逻辑体现了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在制度层面的互动。这类地名集中体现了国家意志对地方空间的符号化编码,其汉语词的借入具有显著的强制性与制度性。

广西壮语地名中常见的军事类地名通名中常见的有singz、cingz、ciengz,即汉语的“城”,表防御戍守的城墙,如马山县的Lajsingz(下城),凭祥的Sungcingz(宋城)等;vingz、yingz、ringz借自汉语的“营”,如龙州的Ndawviengz(内营)、Lajvingz(下荣)等;saih、caih,借自汉语的“寨”,壮语地名“方位词+saih/caih”中的“saih/caih”表防守栅栏或军营,是农民军安营扎寨的地方<sup>[16]</sup>,如隆安县的Lajsaih(拉寨)、凭祥的Bozcaih(浦寨);gván,借自汉语的“关”,如马山县的Lajguen(雅观)、南丹的Gwnzgván(更贯)等;gaj,借自汉语的“卡”,表关隘驻兵设防之意,如凭祥的Gajfangz(卡防);aiq,借自汉语的“隘”,表关口或险要的地方之意,如凭祥的Geuqaiq(叫隘);fuengz,借自汉语的防,表防御、防守之意,如大新县的Gengfuengz(崐防)。这些包含汉语借词的地名主要来源于历代中央王朝的军事行动和屯田制度。它们标志着军队的驻扎地和防御工事,记录了古代中央政权在边疆的军事布防与空间管控,反映了历史上的边防军事要地与关卡设置。这些军事类汉语借词的系统性植入,共同构成了一张覆盖性的权力网格,是国家军事力量在地理空间上实现符号化落地的证据。

在行政建制方面,汉语借词则体现了国家治理制度的延伸。作为行政区划的fouj(府/富),被借入壮语,多指示旧时州治所在地,或引申指代“土官”,如宁明县的Dwngzfouj(亭府)、富进(融安),cou/cu(州或周),如崇左市的Ndoicou(雷州)、大新县的Cujgaeuh(旧州)、横县的Nazcouh(那州)等,反映了唐代以来的羁縻州制及土司制度在壮区的历史存在<sup>[17]</sup>。还有反映清代表示基层编户单位的gap/gyap(甲)。据《清朝文献通考》载:“顺治元年,置各州县甲长总甲之役。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甲”这一汉语词在壮语地名中便存留了下来,如武鸣的Nazgap(那甲)、天等县的Gapdawh(甲地)等,反映了历史上国家行政制度对广西壮族地区的深远影响。此外,壮语地名中各地邮驿类汉借词体现了古代国家行政制度精细化管理。

铺递制度在我国宋、元、明、清四代广泛实行<sup>[18]</sup>，其地域包括壮族地区（尤其是中心城市周围地区）<sup>[19]</sup>；《元史·兵志》记载“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sup>[20]</sup>；明人朱国桢的《涌幢小品·塘报》载：“今军情紧急走报者，国初有刻期百户所，后改曰塘报。”由此可见，壮语 bouq、camh、dangz 均来源于我国古代的“铺递”制度<sup>[21]</sup>，如靖西县的 Mbanjbouh（卜屯）、Runghbouh（部屯）、田林县的 Danjcamh（胆常）、百色市的 Bakcamh（百站）、隆安县的 Lajdangz（拉堂），都是国家为保障军政信息传递、强化边疆控制而建立的基础设施网络在语言上留下的印记。邮驿在广西的发展，虽以加强对壮族聚居区的军事和政治管理为目的，但客观上对壮族地区的交通起到开发和促进作用。而交通的便捷，为各地互通往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繁荣和文化的发展无疑是具有很大作用的<sup>[22]</sup>。

制度整合并非单向的覆盖。地方社会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一定的文化能动性，表现为对底层原生地名的选择性保留，以及在接受国家行政框架的同时，创造性地使用“汉通名+壮专名”等混合结构。这表明地名所反映的制度整合是在中央权威推行与地方社会回应的持续互动中达成的动态平衡。

### 3 结语

军事行政类地名的汉语借词具有显著的强制性或制度性借用特征。这类借用的发生，主要源于国家权力的推行与制度规约的要求。古代中央王朝为实施有效统治，必然将包括行政区划、驻防体系在内的一整套命名规范有力地植入地方。众多军事行政类地名正是这一强制性语言规划的结果。这种借用以权力为后盾，具有自上而下的、不可抗拒的特性，其深度体现在对国家制度框架的语言性内化。

作为记录者，地名的稳定性使其得以保存历史接触的“地层”信息。一个地名可能同时凝结了壮语的底层、汉语行政通名借词的中层以及汉语雅化专名的表层，其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民族交往编年史，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复原历史上各民族互动的线索。地名一旦被创造、接受并世代流传，便从被动记录者转向能动参与者。首先，地名通过日常使用与空间指称，不断强化特定地理实体的文化身份。当人们反复使用这些名称时，名称中蕴含的协作、共享等文化信息便在无意中被持续传递与强化。其次，地名通过教育、传播与地图标识，成为构建地方知识体系与认同感

的标准化要素。它们被写入方志、教材、导航系统，塑造着人们对地方历史与民族关系的“官方”或“常识性”认知。最后，地名作为一种公共符号，能够跨越具体族群边界，成为凝聚更大范围社区认同的纽带。一个被壮汉民众共同使用和认同的地名，其指称的地理空间便超越了单一族群的领地概念，转化为共享的家园象征。

因此，地名是活跃于当下社会生活、持续参与意义生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地方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与情感的重要文化力量。关注地名的能动性，意味着认识到保护和研究地名，不仅是为了追溯过去，而且是为了理解当下、塑造未来共同的认同基础。

### 参考文献：

- [1] 叶蜚声，徐通锵. 语言学刚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 宋长栋. 岭南地名中所见语言的接触、浸润与交融[J]. 学术研究，2000,(09):102-105.
- [3] 覃凤余. 民族交融的印记——柳州地名历史层次寻踪[J]. 广西民族研究，2012,(01):98-102.
- [4] 黄绍光. 广西河池地区壮语地名分类探微[J].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5(05):87-92.
- [5] 韦良元. 广西靖西县壮语地名初探[D]. 东北师范大学，2014.
- [6] 韦达. 壮语地名的文化色彩——壮族语言文化系列研究之一[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4):90-94.
- [7] 覃国生，欧薇薇. 广西壮语地名集[M]. 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
- [8] 盛爱萍. 温州方言地名词的语源及历史层次[J]. 语文研究，2004(3):64-64.
- [9] 王彬，黄秀莲，司徒尚纪. 广东地名语言文化空间结构及景观特征分析[J]. 人文地理，2012,27(1):39-44.
- [10] 吴超强. 壮语地名初探[J]. 广西民族研究，1992,(02):101-105.
- [11] 元立. 壮族地名述略[J]. 广西民族研究，1993,(03):119-126+103.
- [12] 李文波. 广西壮语区地名与壮汉语言接触、文化交融初探[D]. 广西大学，2004.
- [13] 卢勇斌. 壮语地名景观雅化初探[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3):89-94.
- [14] 红波. 壮语地名的缘起、内涵及其特点剖析[J]. 广西民族研究，1997,(03):77-83.

- [15] 蓝承恩. 忻城县地名志, 忻城县人民政府编, 1983. 92-96.
- [16] 元立. 壮族地名述略[J]. 广西民族研究, 1993,(03): 119-126+103. [19] (明) 宋濂等. 元史·兵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7] 班昭. 地名常用字“铺”与古代邮递制度[J]. 地名知识, 1990,(05):92-96. [20] 班昭. 壮语及相关汉语方言中的特殊量词“站”“铺”“塘”考释[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98,(04): 92-96.
- [18] 班昭. 壮语及相关汉语方言中的特殊量词“站”“铺”“塘”考释[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98,(04):